

史家访谈

给中国青年历史学者的几点忠告

——访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美]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Georg G. Iggers) 东 月

张修海 王 昂 译

本刊特约记者东月受《历史教学问题》主编王斯德教授的委托于 2004 年 3 月 17 日对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名誉教授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进行了访谈。访谈录经伊格尔斯教授亲自修定。

：您能否给我们讲述一下您的史学事业？您是在何时、因何原因作出当一位历史学家的决定的？在您做此选择时，对作为职业的历史学是怎样看的？当时您认为历史的意义是什么？而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您是否已经改变了初衷？您仍然认为您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么？对于历史的意义您是否又有了些新的看法？

：我非常乐于回答您以“给中国青年历史学者的忠告”为题通过采访的形式向我提出的诸多问题。能有机会提出这样的忠告，我感到这是一种过高的奖赏，然而我并不以为自己有何非凡之处。因此，我更愿意讲讲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希望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能为希望成为历史学家的人另辟蹊径。

我的事业是很不寻常的，因为我并没接受过常规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应受的教育，而只是逐步演化成了历史学家。我对历史之所以抱有持久的兴趣，是因为我总把它看作是理解我们的过去，形成自我意识感的一种方式；而当我将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时，我并没有将其视作大学历史系或科研机构下的一门学科，而是与哲学或文学一脉相承的一门文科，一本能够更好地了解人类经历的指南。我个人转向历史领域与我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于 1926 年 12 月出生于德国。在从 1933 年 1 月纳粹掌权直至 1938 年 10 月我随父母移居美国这段时期里，我经历了作为犹太人所经历的歧视。幸运的是，就在 1938 年 11 月 9 至 10 日间的那场标志着大屠杀开端的反犹太人暴乱发生的前几周我就离开了德国。我去了美国南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并在那里目睹了美国黑人所受的歧视，而这种歧视使我想起了我在纳粹德国的经历。自那时起我便立志于反击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1950 年我读完了大学的主要课程，与同样从纳粹阴影

下的欧洲逃离出来的妻子一同到了南方的阿肯色州与路易斯安那州的两所黑人学校任教，并开始积极投身于民权运动之中。从这个角度讲，我在规模不大的文科院校里的事业与那些在以从事研究为主的大学里开始其教师生涯的同僚们的事业是大不相同的。

我在德国的经历促使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1940 年我 13 岁那年，我参加了致力于在战后创建民主国家国际联盟的“现在联盟运动 (Union Now Movement)”。1942 年我 15 岁那年进入大学学习，所学专业不是历史而是语言。受统一世界思想的驱使，我开始致力于创造一门比世界语更易掌握的国际通用语。在里士满攻读本科期间我只选了一门历史课程，主修的则是罗曼语系诸语及文学，当然也听了些哲学课程。1944 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研究生，研究德语及文学，从关注语言及语言学转向关注比较文学及思想史。获硕士学位后，我在纽约市新社会研究院呆了一年，专门研究哲学和社会学，同时也在联邦神学院听了一些有关当代宗教思想的课程。次年回到芝加哥大学后，我没有选择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而是决定到专门研究文化史的跨文化委员会读博，专门进行对 19 世纪欧洲文化的广泛比较研究。对于那个时期乃至后来的我而言，学术不可以与社会及政治责任分离开来。我写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圣·西门的政治哲学，一个早期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其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以及其历史哲学。当时的专业历史学者滥用历史以鼓吹其民族主义信条，我对此深感震惊。因此，在博士毕业后，我的第一个较主要的工作便是评判 19 世纪及 20 世纪中前叶的德国的历史专业。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一方面声称自己是客观的学者，但在学术上却是高度的空想，他们尽管不是直接的为纳粹上台负有责任，但是通过其所持的反对民主

价值观的民族主义立场为纳粹掌权铺平道路。我所关注的是一个人怎样能够做到既客观同时又能够对构建一个民主的、具有社会公正的社会负有责任。至于你提到的那个问题——我是在何时决定作一名历史学家的，我只能说我从未在某一时刻做出了这一选择，而是慢慢地向它靠近。历史对我而言绝非一个特别狭隘的专业化研究领域，而是包容了人类全部的经历。从这个角度讲，我的历史观还从未改变过。如果说有所改变，莫不如说是变得更为全面了。在我的学生时代及后来的许多年里，文明史主要是指西方世界的文明史。我很久就不再受限于国别史。我的史学作品，甚至那部德国史学作品，都是比较性研究。然而这些比较都没能超出欧洲及北美。我目前的工作旨在超越西方，形成全球观。因此我现在对于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中国史学思想及编纂的传统很感兴趣。至于历史的意义问题，我认为我所说的历史，其意义不具有单一性。将意义赋予历史的不仅仅是历史学家，还包括广泛的人民群众，因此历史拥有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意义，而具体的意义则取决于在其中寻求意义的个人及群体。实际上我曾认为历史有一个方向，是逐步通向更自由更公正社会的一个进程。我现在仍然相信我们应当为这样一个社会而奋斗。但我们是否正向这个社会前进，我还没有把握。事实上，20 世纪及本世纪初的种种恐怖事件所指向的并不是这个方向。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努力，而是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的希望未必一定能实现。

：您是如何视历史为职业的？其主要特点有哪些？其实质是什么？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又是什么？

：写历史是由来已久的事了。西方写史的伟大传统可追溯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而中国则是司马迁及更早。但历史成为职业则是较近的事。在中国，编史职业化在某种意义上是随着唐代史馆的设立而形成的，但这种编史主要写的是更早朝代的历史，而非广义上的历史，并且具有浓厚的官僚气氛，以致于官僚是在为其他官僚编纂历史，而不是为更为广泛的公众写历史。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职业化编史是过去二百年的结晶，可追溯到历史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在德国大学成立之时。它是在 19 世纪及 20 世纪初期之间从全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筛选出来并历经修改而成的一种模式。职业化是指历史学家依附于某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并接受研究方法的培训，其作品可以由其他职业历史学家进行审阅及批评。职业化的历史包含着一种对各民族的精神毫无偏见地进行研究与编纂的作风。编史应基于原始材料，而原始材料又须经过严格的方法论的分析。历史学家应做到“客观”（这是兰克 的用语，许多人称其为“历史科学之

父”），从他要接受道德的审判这个角度讲，则应做到“公正”，并按“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重构过去。然而问题在于职业历史学家在具体操作时虽宣称是客观的，却倾向于用某种具体的观点来编纂。19 世纪职业历史学的兴起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息息相关，同时还反映着党派人士的政治观点。另一个问题是，历史在成为一门学科后逐渐与其他相关研究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及哲学拉开距离，而专注于政治。因此，历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片面性。历史职业化的巨大优势在于历史学家以特别审慎的态度来调查历史问题，即在一个更为坚实的事实基础上进行历史描述。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只要是被不断进一步职业化的学者用来为其他职业化学者编史而非为了更为广泛的公众群体，那么它就蕴含着危险。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年来随着历史学家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地向跨学科方向发展，这种狭隘观已经基本被克服掉了。再者，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有些历史学家能够克服职业化的局限，编纂了一些经过仔细调查同时又可以面向广大群众的历史。以我的观点，历史学家的主要责任仍然是做一名审慎的研究者，清楚地知道他或她总会以一种反映其政治、社会价值及哲学观的观点进行编史；同时还要诚实，了解自己的不足，不歪曲事实。

：您的史学研究经验丰富，可否讲一下您在此领域内的一些主要经验？您是否也得到过一些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又是什么？

：我首先必须申明，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历史学家。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我属于文化理性型历史学家，是以这种观念来接近编史的。我的作品只是偶尔涉及到文献研究。我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类似于文学批评家对于文学的关系。我是编史的批评家，而只有在我是研究历史思想史的学者这层意义上，我才是历史学家。

：您能否简要描述一下西方史学理论最近的主要发展趋势及新的特点？您认为青年历史学者应当如何理解西方史学理论中发生的这些新变化？您对他们有哪些忠告？

：我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及编史领域发生了两次极为显著的重新定向。20 世纪中期，一个颇为陈旧的以 19 世纪及 20 世纪职业化编史为特点的工作模式被各种有社会科学倾向的工作模式所取代。较陈旧的那种模式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强调事件与个人的唯一性，并倾向于我们前面所见到的那种用专注于政治史的方式进行编纂，忽视了社会因素的解释。在进入 20 世纪之时便已开始的而直至二战后二十年内才

达到顶峰的一种模式是，许多历史学家寻求将历史转化为一门用于检验社会结构及变化进程的分析型社会科学。陈旧的那种模式，尤其是在德国，经常用于捍卫保守的政治机构，是来自于上层的历史。而社会科学模式，尤其是在美国，倾向于形成以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及全球化稳步发展为趋势的现代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及欧洲主宰地位的摧毁性因素的批判以及对保护环境、扩展国内妇女与受歧视少数民族乃至至于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与日本以外的前殖民地地区人民的权力等问题的关注，导致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产生。通过用以社会科学倾向为特点的对欧洲及北美的侧重来取代以往的历史发展及进程的乐观主义观念。新的方向反对宏观历史研究方法，崇尚微观的历史研究方法，更注重普通人民的生活及经历，是来自于下层的历史。像社会学、经济学这样的分析、经验型社会科学为文化人类学所取代，定量方法让位于历史的定性方法。在社会科学取向方面，用文化因素来解释历史变化变得比强调社会及物质力量因素更为重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意识（不仅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而且也包括西方生活模式在全世界的蔓延，同时还包括在这些区域内西方文化所遭遇的抵制）产生了新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使用社会分析但同时又认识到与全球化相互作用的强大的文化力量。对于中国的年青历史学者来说，正如对于其他任何地方的历史学家一样，关键是要牢记 20 世纪及现在的 21 世纪中蕴含着相当数量的历史研究方法。所有这些方法都为历史学的理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却没有哪一种方法能够一锤定音。他们应当明白，历史研究代表着一个正在不断演进着的对话，并随着政治、

社会、物质及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自我修正。

：对我们中国青年历史学者您最想说些什么？您对这些中国新一代的史学家有什么主要的建议？

：为中国乃至其他地区的年青历史学者提供细致的建议我愧不敢当，使我觉得自己俨然是高高在上的历史学家一样。更年轻的历史学者较我这样的老朽通常有着更为独到、更具批判性的观点。应当强调的是，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即便是世界上文化各不相同的地域内的各种传统会给这些地区造成一定的特殊性。然而现在的中国不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了，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青年历史学者应当了解这种智力需要，并对世界其他区域的历史有所研究。这里我不仅指西方，还指日本、韩国及印度。这些区域正在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对现代历史思想的再思索。然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学生应当了解西方世界的理性思潮，而且西方的学生也一定要更加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区域的历史思想。必须涌现出更多的译作。西方著作的汉译作品的数量已具相当规模，然而遗憾的是，中国著作的西译版却寥寥无几。且青年学者与有经验的学者之间必须要有更多的双向交流，即走出中国及进入中国。

：您觉得为促进中西历史学家间的交流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我没有什么新的想法，然而我坚信应当有更多的双向交流。会议很重要，但学生及学术团体之间的交流更为重要些。应当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以保障这些交流活动的顺畅进行。

注 释：

大屠杀 (the Holocaust) 指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译者注

反犹太人暴乱 (Anti-Jews Pogrom) 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地反对犹太人公民，抢劫其财产的暴乱，参见埃尔德曼著《德意志史》第 461 - 2 页，商务印书馆，1986。——译者注

兰克 (Leopold von Ranke)，1795 ~ 1886，德国历史学家，1825 ~ 1871 任柏林大学教授，1841 年起任普鲁士王家史官，为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译者注

(上接第 27 页)

Arno Klönne,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Geschichte, Ziele, Wirkungen Düsseldorf, Köln 1980, 第 102 页。

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33 ~ 134 页。

⑪徐新：《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第 198 页。

⑫朱正析、林树众：《联邦德国的发展道路——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4 页。

⑬彭云龙：《谢罪与翻案——德国和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罪行反省的差异及其根源》，解放军出版社，2001 年，第 128 页。